

萧伯纳师生天津相聚

张希

1933年2月,77岁的著名剧作家、文学评论家萧伯纳先生偕夫人,乘坐“不列颠皇后”号邮轮来到中国。作为萧伯纳夫妇环球旅行的重要一站,此次中国之行,他们先后游览了香港、上海、秦皇岛、北平等地,受到宋庆龄、鲁迅、蔡元培等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。在此期间,萧伯纳先生一行还曾途经天津,当时天津新学书院的院长黄佐临受南开大学之邀,正在该校英文系教授“萧伯纳研究”与“狄更斯研究”两门课程,所以对于萧伯纳先生和他的文学成就,南开学子非常了解。闻知萧伯纳来中国了,南开学子奔走相告。最终,在黄佐临的带领下,学生们赶赴火车站,见到了这位享誉世界文坛的文学巨匠。当得知南开大学开设了有关自己的文学课程时,萧伯纳表示非常高兴。

对于萧伯纳来说,黄佐临那是再熟悉不过了。1906年,黄佐临出生在天津余庆里一个洋行职员的家庭。他从小就对戏剧充满了浓厚的兴趣,由于一直就读于教会学校,所以他的英文水平很高。这为他未来学习西方戏剧奠定了基础。不过,当时的黄佐临还不知道这些,戏剧对他来说只是个爱好。

1925年8月初,黄佐临离开天津踏上了第一次赴英留学的行程。根据父亲的要求,他进入伯明翰大学商科学习。但他很快发现,他对所学专业并不喜欢,反而对社会研究充满兴趣。如何对社会问题有更深刻的了解,黄佐临又想到了戏剧,尤其是易卜生、萧伯纳反映社会问题的戏剧作品。在学校黄佐临积极参与戏剧社的创作和演出,1927年由他自编自导自演的英文独幕剧《东西》在学院周末晚会成功上演。这是21岁黄佐临的处女作。转过年来,由他创作的第二部作品《中国茶》上演,再次获得成功。

很快,这个爱写戏爱演戏的中国小伙子,在学校“火”了起来,同学们感觉他的创作风格很像萧伯纳。在大家的“怂恿”下,黄佐临给这位心中的偶像写了一封信,并附上了处女作《东西》的剧本。当时的萧伯纳在世界文坛可是炙手可热的人物,就在1925年,萧伯纳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。令黄佐临没想到的是,仅仅过了三天,他便收到了萧伯纳先生

的回信。在信中,萧伯纳鼓励黄佐临:“不要做大师的学徒,而而努力成为大师,开创属于自己的艺术风格。”萧伯纳和黄佐临的师生之缘,也就从此开始。

1929年9月,黄佐临结束了四年的留学生活,回到了天津,在亚细亚石油公司做了一名顾问。因工作比较清闲,他有大量空闲时间。经著名教育家张彭春先生介绍,黄佐临来到南开大学教授戏剧研究课程。在此期间,他与年轻的曹禺成为挚友。

1935年,29岁的黄佐临开启了第二次留学生涯。这次他彻底抛开了商科,投入到他所钟爱的戏剧艺术之中。他在剑桥皇家学院师从法国著名戏剧导演圣丹尼。在此期间,他经常有机会和

萧伯纳见面。当得知黄佐临终于如愿以偿投身戏剧事业时,萧伯纳表示非常欣慰,并予以支持。

1937年7月10日,得知“七七事变”爆发的消息,满腔悲愤的黄佐临毅然结束留学回国。刚过完81岁生日的萧伯纳给自己这位中国学生写下了这样的临别赠言:“起来,中国!东方的世界是你们的……”

黄佐临可以说是非常幸运的,刚刚踏入文坛便得到大师的鼓励与指点,而且这种鼓励与指点还一直伴随他的成长。最终,如萧伯纳期待的那样,他也成为戏剧大师。

萧伯纳与黄佐临亦师亦友,在他们多年交往经历中,想必1933年的天津相会最为特别。黄佐临在自己出生、成长的这一方热土,迎来了引领自己走上艺术道路的导师。这对大师师生在天津的相会也成为了一段文坛佳话。

俞曲园,名樾,著名作家俞平伯的曾祖父。浙江德清人,清道光三十年(1850)进士,曾出任河南学政。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,成为一代朴学宗师,门下培养出张佩纶、章太炎、王修植等众多名臣、学者、艺术家。

俞氏家族与天津有难解之缘。同治元年(1862)春,为躲避江南战乱,俞樾一家二十余口人乘坐帆船,经过七十天的海上颠簸,抵达天津,得到了驻节天津的老同乡,时任三口通商大臣、署直隶总督崇厚的盛情款待,并被邀请纂修《天津府志》的卷首一卷。

俞樾在津矢志于经学著述,完成了《群经平议》的著述,《诸子平议》也著成大半。正在他感到“《平议》成书世未传,每愁枉费此丹铅”的时候,津门有位叫张汝霖的富家子弟,在读罢《群经平议》第十四卷专论后,竟要取之出版问世。俞樾得到消息后,兴高采烈,感叹自己几年的闭门著书总算渐为世人所知。

清乾隆初年修《天津县志》,“蔬属”记瓜,有甜瓜、香瓜(甜瓜中形小而味尤香甜者)、丝瓜、冬瓜等,并说明为“《天津卫志》所载瓜类”。从康熙卫志到乾隆县志,中间60余年的光景,人们依旧生吃甜瓜、熟食冬瓜,是挺自然的事。也有新品,县志修纂者没有忽略,记录在册:“今据所产,又有倭瓜,一名北瓜。”并非都是从书本到书本,也记下采自生活的内容。

倭瓜之名,见于清代。《红楼梦》写刘姥姥二进荣国府,带礼物“枣子倭瓜并些野菜”。行酒令,还来了句“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”。将乡野风引进大观园,曹雪芹似乎特别在意倭瓜。

倭瓜又名北瓜,这说起来有点“南北混淆”。倭瓜被归于南瓜那一大类。当年南瓜北种,却往往以北瓜称之。不仅津门地方志如此。乾隆年间《宁河县志》载,“北瓜,俗名窝瓜,皮绀瓤红,味亦淡甘”。倭瓜、窝瓜,同音异字,“窝”当来自“倭”。许多年来,市场上广泛使用的名称,是“窝”而非“倭”。

旧时天津有两处周河公祠:一为津南区小站的祭祀淮军将领周盛传、周盛波的公祠;另一为河东区小孙庄的祭祀晚清名臣周馥的专祠。

河东周公祠亦称周孝友堂支祠,占地31亩,建筑面积965平方米。初建有房屋24楹;其中大门三楹、东西耳房三楹、正殿三楹、东西库房三楹、垂花门一道、影壁一道、水楼一道。后增加长廊、房舍达100余间。

河东周公祠主体为天津家祠、周孝友堂支祠。祠之东北,别筑荐福庵,“祀四方诸佛,招僧主之,以奉公祀事”。祠西为馆舍,为值事者所居。西南角为周氏广慈善堂。家祠的后院为藏书楼,该楼为上下两层,并有一层地下室。楼梯设在两侧。楼内存周馥的手泽书籍及遗墨碑版。藏书楼正后方,有五间平房为师古堂家塾。由师古堂往南为祠堂花窗。藏书楼西北角临一长圆形月牙湖,湖中饲养金色大鲤鱼,月牙湖南面有三层高的畅观楼,东面有凉亭。祠外空地建房屋,收取租金,为修葺祠堂所使用。

历史长镜头 原海大道



海大道,即现在的大沽路,全长11.067公里,是年代最悠久的道路之一,始称海河叠道,1665年由官商捐助修筑。1860年部分路段沦为租界地,贯穿法、英、德租界等。1926年在早期土路的基础上,修建为平整的公路。这条路上曾有马大夫医院、英国菜市、法国菜市、高林洋行、先农公司、礼和洋行及天津女青年会等历史遗迹。该路后分为南北两段。2005年至2009年间,对该路实施了拓宽工程。



徐世章以古物收藏名重一时,其所藏古玉多得津门古玉鉴定家顾德威之助。顾氏幼喜古玉,研究精深,曾专程赴北京、上海、洛阳、安阳代徐

古玉收藏 然君

方摆着两台木壳电视机,屏幕上京剧演出的画面。背景是当时的著名建筑——1954年9月竣工的北京展览馆(旧称苏联展览馆),楼顶塔尖周围还画着“信号圈”,广告下端写着“国营天津无线电厂出品”大字。时间到了1981年,北京牌860—1型电视机获得全国评比一等奖,这一信息也出现在同时期的广告上,其上还特别注明“中国第一个生产黑白、彩色电视机的厂家”,显示厂址为河北区东七经路15号。此后不久,在860—1型的基础上又生产出860—3型31厘米(12英寸)全频道集成电路黑白电视机。

世章收集珍品。在敌伪统治时期,各地查戒森严,有时为了征得一件古玉,甚至要冒着生命危险。徐氏藏品凝聚着顾氏的诸多艰辛。

老口福 脂油饼

杨世珊

过去在农村,脂油饼只有杀年猪后才能吃上几回。

脂油指猪板油。做脂油饼时,先将猪板油切成指甲盖大小的块儿,把和好的白面擀成饼剂子,撒上盐、葱花、猪板油块儿,再擀成薄饼,大锅里也放些猪板油块儿。热锅,等油化了,放饼,在火力作用下,饼里外受“煎熬”,顿时满屋飘香,令人垂涎欲滴。三翻两翻之后,猪板油全化了,锅里“滋滋”响,油滋润着面饼,面饼变成了油饼,最后烙成两面儿金黄的嘎儿,出锅。

记得儿时,妈妈做好一张脂油饼后,会用铲子切成八角,盛入盘中。我们便趁热大快朵颐。所谓“一热抵三鲜”,脂油饼就得趁热吃才

香。妈妈做脂油饼时,必做白米绿豆稀饭。这两样食物搭配着吃,一绝。白米绿豆稀饭缓解了脂油饼的油腻感,还让脂油饼入口更顺滑。

现在,许多人对猪大油都敬而远之,以前吃腻的窝头野菜,反而受到人们的青睐。这反映了我们社会的发展与进步。以前人们肚里没油水,吃饭只为吃饱,能偶尔吃得香,就算打牙祭了。现在,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已极大提高。人们的饮食已经从吃得饱吃得香,转变为吃得营养吃得健康。

如今,脂油饼已经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。但是,每逢秋风乍起,我就不由得想起妈妈烙的脂油饼……

中波段收音机,其元器件通过替代改良,大大降低了成本。1955年该厂又以国外产品莫斯科人牌收音机为蓝本,成功研制出北京牌(206型)四灯来复式超外差式收音机。

笔者收藏的此收音机的广告说明书为32开大小,其上可见收音机的外观是深棕色电木壳的,体积小巧,结构简约。广告画意清静沉稳,画中桌子上铺着钩花台布,上面放着收音机与花瓶,机器后还垂下淡绿色的窗帘,类似陈设在当时已属奢华家居了。这

台收音机虽为四灯机,然广告纸背面说明中特别标出一句:“其实效与一般五灯机相同,能收听各地广播电台的中波和短波广播。”它一上市便大受欢迎,曾在华北市场畅销不衰,由于式样小巧精致,人们也称它“小北京”。

故事天津

人人爱“北京”

由国庆

北京牌收音机、电视机是老天津的名牌拳头产品,曾红遍大江南北,它的广告与说明书故纸也铭刻了这段光辉岁月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天津无线电工业从改装、仿制国外产品开始,不断提高自身设计与生产能力,由装配生产向设计制造过渡。1953年,国营天津无线电厂(712厂)设计投产了工农之友牌两灯

圣若瑟女校

张绍祖

圣若瑟女校于1914年设在大法国路(今解放北路),专门招收女生、走读兼寄宿的学校。1918年迁移到杜总领事路(今和平路)与威尔顿路(今承德道)拐角处。1923年在法租界贝拉扣路(今和平区哈尔滨道182号,原市十一中学校址)建成新校舍。该校1914年只有46名走读生,14名寄宿生;到1925年则有200名走读生,50名寄宿生。该校由幼稚园一直到高中毕业。毕业后由剑桥大学鉴定考试后即可升入国外大学。1951年,人民政府接管了圣若瑟女校的一部分,定名为天津市第四女子中学。1979年更名为天津市第十一中学。和平区哈尔滨道182号老楼作为天津市重点保护的历史风貌建筑尚存。